

尊重常识的言说 独唱亦能成团

□ 本报评论员 李晓亮

这是一本一出生就已被风华正茂的杂志,它在出世前就被讨论了整整一年有余,已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一种价值象征。甚至你可能去买,但未必会看——微博上都在说“今天(7月6日)不买本《独唱团》就落伍了!”

这本杂志不会大卖,文本如何,是部“文艺片”还是“战争片”,这些或都不是关注的重点。从先张扬的舆论关注来看,焦点早已超出杂志本身。

大众为何会对一本连刊号都没有只能以书号代替的“杂志”寄予厚望?因为他们从这本杂志主编的日常言行,从这位全球博客访问量最大的博主的博文里看到了一种独有的力量。

一个高中肄业的学生,他的知识体系自成一统,全靠自己冲锋陷阵、盲打误撞的点滴“试错”汇聚而成,然后他道出“世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逻辑,一种叫中国逻辑。”如此韩式妙语,出乎直觉而立足经验,貌似愤激之论,却与哲人高见不乏偶合之处。这话是书上没有的,但人们看了,似乎又有种心有戚戚的欠欠之感。

他被视作意见领袖,但他却认为这有点像公共厕所的感觉。其实这个比喻很恰当,公厕服务公众。假如将捍卫常识直指人心,平等坦诚智慧的公共表达喻为公厕,那公厕数量显然不能满足民众需求。倒是那些垄断的所谓精英话语,或者假大空式通报发言,如内饰豪华配以黄金马桶的五星级厕所,越来越多。可这些设施要么不对外开放,要么价高而质劣,空耗社会信任。这又将更多人挤向韩式公厕。

世人皆知“官话累人、官腔雷人、套话烦人、假话坑人”。在信任日渐稀缺的语境中,轻侮民智的“官样文件”和公文表述,就成了失去现实粘合力的语词碎片。说者不以为意,听者嗤之以鼻。认认真真走过场的作秀氛围都成了奢侈。所以,改造我们的说话,刻不容缓。

而要想表达有感染力和亲和力,显然应先弄清有效的表达以什么为内核。有时我们的写作、说话等表达,出发点也许是好的,正义感无懈可击,道德力量无可怀疑,但就是在价值内核上露出了破绽,于是前功尽弃。要不违背人类的基本理性和崇高情感,表达的观点就要与正义、自由、善良兼容,用常识说话,让受众感受到平等和尊重。

权利张扬的时代,民智已开,独唱亦能成团。对权利和尊严的敏感,与日俱增。这时,不管是官方讲话发言,还是公共媒介信息传播,其话语体系都需以对公人格、尊严、智慧的尊重为前提,更人性更文明,更符合法治诉求,才能更得民心,更顺民意,更益于社会和谐与进步。

(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 24版)

本版稿件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版热点评论由本报与新浪每日评论共同关注 http://news.sina.com.cn/opinion/index.shtml

因思考而厚实 因发言而精彩

博客网址http://blog.sina.com.cn/u/1280948683 投稿邮箱:huaxiruiplingun@126.com

粤语改普通话,有必要吗?

□ 欧木华(湖北医生)

日前,广州市政协召开全体会议,提交“关于进一步加强亚运会软环境建设的建议”,提议广州电视台可在综合频道或新闻频道的主时段用普通话播出,以适应来穗参赛和旅游的国内外宾客语言环境的需要。调查显示,20%受访者支持,80%人持反对意见。(7月6日《新快报》)

客观而言,如果笔者作为一个游客在亚运期间来到广州,我也愿意看到广州提供足够的普通话节目以满足外乡人的需求。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将部分粤语节目改为普通话,牺牲本地人的需求来满足来客的需求,很难说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是增加一个或多个普通话频道,这样既能尊重广州本地人的选择,又能满足外来宾客的需求,而且还切合“爱我广州,办好亚运”的主题。如果将粤语频道改为普通话频道,笔者担心,这或多或少会对“爱我广州”的主题造成伤害。

如果认为增加一个或若干普

通话频道,在资金投入上可能存在问题,那么,考虑到CCTV众多频道早已落地广州,目前暂时维持现状不做大的改动,也未尝不可。当然,作为流动人口众多的城市,从长远来看,广州还是应该提供一些普通话的本地频道,以满足各阶层人士的需要。另外,广州应该也可以收看诸多上星的卫视节目,换言之,语言需求并非一个影响亚运的关键性问题。若是过于强调外宾的语言需求,恐怕最应设的是外语频道——这更能彰显大都市“范儿”,但这靠谱吗?

有人或许会反驳,普通话是法定通用语言,粤语为何不能暂时让位?确实,强调普通话的作用并不过分。国家也在大力推广普及普通话。《广播电视管理条例》也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应当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

如果片面理解上述规定,恐怕会觉得广州所有频道都改为普通话播音才好。这显然是死板的理

解,其实国家从来没有出台法律法规打压力方,将普通话与方言对立,本就是错误的。另外,法律法规强调普通话的重要性所使用的措辞是“推广”,而非“强制”,这一点必须明确。

各地电视台都有很多方言剧和方言栏目,方言的魅力是有目共睹的,我们在强调推广普通话的同时,也应该重视方言,不必为了强调普通话的正统地位而贬低方言。方言传承着文化,是普通话的基石,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对于方言,应该有包容之心。包容与赏识地域文化和推广普通话之间,其实并不存在矛盾。

粤语与普通话之争,在过去可能难以出现,此类问题根本就不成问题。今天,出现这样的争议,我以为总体而言是好事,它昭示着公众对地方文化的认识在进步。我们对方言的探讨必须要抛开地域偏见,地域歧视心态,不然,文化不可能真正开放和包容。

文化开放性需要多元共存

□ 李劲强(江苏教师)

语言是一种符号,语言也是一种文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培养了一方语言和文化。人们之所以在语言的变化上反应敏感,原因不仅在于听不舒服,说更方便,更在于一种文化认同的差异。而这种文化认同通常是较长时间养成的,尽管人们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接受新的语言,甚至可以学会使用新的语言,但语言背后的文化却很难短期内改变。这种文化的稳定性和稳固性,让人们在面对语言表达的变化时,不能轻易接受。

其实,任何的社会人都是文化人,都处于一定的文化浸染之中。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广东本地人习惯接受粤语的表达,认为纯正的粤语是广东文化的外壳,如果剥去了这层外壳,则文化将失去有效载体,文化之归属感将不复存在;同时,对于那些外来人口来说,他们却会在粤语面前迷失自己,尽管他们对粤语并没有什么偏见,但是因为交流的障碍还是让他们感到一种陌生感。于是,这种矛盾就出现

了:有人认为广东应该坚持本地文化,本地语言;有人认为广东应该立足广东,放眼全国,成为一个更具文化开放性的城市。

争议虽然激烈,但更应关注一个本质问题:何为文化的开放性?毫无疑问,文化需要开放,若一种文化抵触开放与交流,满足于自身的语言体系,则这个体系的缺陷将不易被发现,这个体系的优点将难以被传播,整个文化体系将处于一种停滞的状态。而文化是应该促进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如果文化停滞,则这种文化影响下的人也将呈现出一种停滞的状态。显然,这样的一个结果是现代人所无法接受的。因此,文化开放是一个必然,在开放,交流中文化之间可以相互修复,相互促进,最终使不同文化都焕发出新的力量。

当然,开放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更不意味着以某种文化之外的力量促使其放弃。开放的前提之一,是开放应该具有恰当性。开放是为丰富人们文化需求,满足多元需要,而不是以一种文化代替另一种文化。因此,在一些关系到文化核心内容的领域,本地文化必须坚持。这些领域可能是某种语言,某些理念,某些仪式。开放的前提之二,是开放应该体现公众的主体性。文化是为人服务的,文化是否重要,应该交由公众自主选择。一方面,公众多元的文化需求应该满足;另一方面,尊重公众的需求倾向,让主流文化在公众的真实需求中产生。

语言是文化载体,改变语言表达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文化更好地满足人们需要,让文化更加先进。而文化的先进性离不开开放与坚守;开放可以让文化在更广阔的视野中实现自我提升;坚守可以让文化在更频繁的交流中保持自我的特色。因此,在讨论电视节目以哪种语言播音时,既要看到开放的需要,又要对开放尺度做一个判断。一种理想的结果是,公众的多元文化需求得到满足,同时最原汁原味的本地文化也得以传承。而这个结果,离不开文化的交流与公众的选择。

普通话流行不是洪水猛兽

□ 吴帅(广东职员)

普通话播音引争议,广东著名传媒人陈扬认为:广州TV将出现天坑!被消失的方言后面必定是被弱化的文化。用什么样的语言播报新闻?不只是不方便的问题,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不小心触及到人们的某种心理敏感区。否则,你很难想象,这一条看起来并不算太过的建议,会引起如此反响。广东的电视里“让普通话更流行一些”,真的如洪水猛兽般可怕吗?我看未必。

首先,广东数千万人口,或许有近一半人不是讲广东话的。广州一千多万人,其中至少有2/5的人是外来人。可以预计,在亚运会期间,外来人口或许还要多。从这一个客观数字来看,临时增设一些普通话播音的要求并不过分。

同一地域的人用同一语言对话,的确可以传递出某种情感与文化的认同。但在这样一个无比开放与交流频繁的时

代,如果一种地方语言成为不同地域间人们沟通的一种障碍时,政府该怎么办?社会又该怎么办?

解决这种冲突或有三种选择。一是说粤语的广东人主动开口说普通话或者是英语。这并不难,如果说难,不是难在多数人不懂普通话,而是难在他们是否愿意转换心态。二是外地人加倍学习粤语。当然,这对相当大比例的外来人来说,也很困难。第三种选择,就是提供多元的语言交际环境,让说什么语言?成为人们的一种自然选择。既不必放大普通话的重要性,也无需刻意强调粤语的地位。让社会更开放,文化更融合,让某种语言不再成为纠结的难题。

现在适度增加的普通话播音,就是一种纠偏一种努力,表明政府在做出最明智的选择。那就是用包容开放的心态,让语言真正多元起来。

“城市病”实为政绩病

□ 李先祥(山东教师)

655个城市正“走向世界”,183个城市要建“国际大都市”……回首十年,一波波造城潮风起云涌,圈地规划不厌其宏大、地标建设不厌其豪华,一番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之后,有时却陷入形象上不叫好、经济上不叫座的尴尬——发展中的城市如何防治“城市病”? (7月6日《瞭望东方周刊》)

“城市病”的表现症状总是那么惊人地一致:气吞山河的口号、匪夷所思的规划、一掷亿金的投入、举步维艰的结局。因此,从表现形式上来看,“城市病”还真具有了流行性传染病的特征,但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城市免疫力太差,而是因为有些管理者有着相同的致病基因——浮躁的政绩冲动。

如何防治“城市病”?很简单,就是规范和监督权力,尊重民意,让民意成为能够和权力平等博弈的重要力量。每个公共决策者都有民意广泛参与,劳民伤财的“城市病”才能根治。

有感于唐骏的非名校文凭

□ 毛建国(江苏职员)

从7月1日开始,方舟子连续在微博上爆料称,新华都集团总裁唐骏在加州理工大学学院的博士学位系伪造。昨日上午,唐骏接受专访,正式回应“造假门”事件。(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 19版)

据唐骏介绍,他获得博士学位的是美国私立大学Pacificwestern,唐骏自我翻译成西太平洋大学。我不知西太平洋大学是所什么样的大学,但它至少不是如哈佛、耶鲁一样的名校。

唐骏的助手说,“唐骏不是靠学历吃饭的人”。唐骏靠的是能力而非文凭,这人们都知道,但大家还是对他的文凭好奇。这说明一点,很多人把精英人物标签化了。

在很多人眼里,身居跨国企业高层的,一定是哈佛、麻省理工,或其他名校的。尤其像唐骏这样有“打工皇帝”之称的顶级职业经理人,似乎没有一个显赫名校,配不上他身份,也担不起公众的期望。公众潜意识里,有着深深的名校崇拜。正是这一情结,让唐骏文凭“造假门”愈演愈烈。澄清唐骏文凭真相,有助于我们认识当前的名校热。

非名校文凭并不影响唐骏的成功。其实,不仅精英与名校之间没有必然关系,精英与文凭之间也没有必然关系。这个社会,还是能力最重要。唐骏文凭“造假门”,对于学子、家长和用人单位来说,都有着一定启示意义。

麦乐鸡事件背后的“本本主义”

□ 吴龙贵(安徽职员)

日前有媒体爆出,麦当劳出售的麦乐鸡含有两种化学成分:一种是含有玩具泥胶的“聚二甲甲基硅烷烷”,另一种是从石油中提取的“特丁基对苯二酚”。

对此麦当劳中国公司回应称,这两种物质含量均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副所长郭子侠称,上述物质不属于食品添加剂的常规检测项目。(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 18版)

麦当劳方面坚称,这两种化学物质“含量完全符合标准,对消费者无害”。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这样的解释,也无可厚非。问题是,检测添加剂安全性的是人体,而非标准。何况“自证清白”的说服力也有限。

从这个角度来看,卫生监管部门应对此事的从容和淡定就更让人费解了。北京市食品办负责人表示,“具体使用中是否超量,有待相关部门进行调

查”,而该市卫生监督所则表示,“如果事态有进一步发展,监管部门会及时调查”。

对比之下,两个问题显而易见:麦乐鸡在中国的食用群体无疑非常可观,但为何监管部门对其添加剂的含量等信息近乎空白?其二,既然监管部门都心中无底,何不第一时间介入调查?

民调显示,有7成网友不相信麦乐鸡中的化学物质对人体无害。民众对食品安全的焦虑已经非常明显。在这种情况下,监管部门仍表示两种添加剂“不属于日常检测项目”——就等于是一纸免责声明。

这种“本本主义”管理思维,也让人忧心。检测不可穷尽一切有害物质,未知的食品安全危机随时可能发生,作为监管部门,当然不应只是按图索骥,抱着一本“检测标准”不放,而应对食品问题采取“零容忍”态度,不放过一切可疑之处,为公众筑起一道安全防护墙。

Advertisement for Audi A6L featuring a silver car, the Audi logo, and a large graphic of Chinese characters representing 37 million users. Text includes '30 years of quattro', 'Audi 突破科技 启迪未来', '万姓, 一信', and '奥迪A6L 37万用户的称心, 成就您的信心。' It also lists regional dealerships in Sichuan and Chongqing.